首倡在我国培育体育师资的人
新津邓子完事略

邓子完名莹诗、自号顽石公，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新津县城西仓巷人。邓家世代习儒，笔耕为业，子完为县廪生。邓在攻读诗书之暇，在伯叔辈的指导下，曾研究中国古代操法多年，对古代操法颇饶兴趣。

子完青年时，值我国维新变法时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革除弊政的维新思潮蜂起云涌，席卷全国。邓子完接受了康、梁维新学说的思想，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意在富国裕民、强种强身，洗除东亚病夫的耻辱。邓潜心攻读体操、柔术、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教授法诸科，并常就体操理论同日本哲学家高岛氏进行探讨。当年邓即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

１９０６年５月，邓由日本回国，随即在四川通省高等学堂附设之体育科担任教师，讲授有关体育各项课程，着重于培训体育师资，为在全国开展体育教育工作打下基础。在教学中，邓深刻意识到以他个人的力量和努力，是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必须要有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毅然上书清廷学部①，陈述自己的意见。书中指出："身体不坚全者，道德不隆，精神不完健者，知识不确，学问源于精神，精神源于身体"。他首先指出了身体、精神和知识的密切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着分析了我国体育教育令人痛心的现状，指出：内容上“不过军事操练而已”；层次上“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师资则尽是军营粗人，目不识丁，口不言文；至于体操与生理、心理，道德的密切关系，更是一窍不通；且作风浮躁、品行低下，“朝酒夜色”者不可胜数。邓认为学生的气质在于驯导锻炼，而关键在于教师。

邓又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况，向清廷学部指出：无论德国、瑞典还是日本，早就开办了各种类型的体育师范学校。这些国家由于十分重视体育教育，尽力提高国民身体、文化素质，因此相继成为世界强国。面对这一现实、邓竭诚呼吁：如果不迅速改革现状，认真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要使“全国之民精神振作、学问发达、道德增进，以期比驾于列强”，是绝不可能的。为了振兴我国十分落后的体育现状，邓从体操方面进行了理论解剖，指出学校推行的体操，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学习阶段的不同而各有所宜。并就如何培训师资，在教材、科目的设置上呈述了具体作法，附送了章程。最后邓再次恳请清廷：“苟非在上者提而倡之，扩而充之，目为重点，肩为急图”，那么我国体育的落后面貌是不会改变的，教育的现状也是不可扭转的。为了引起当局的重视，邓子完不怕犯上罹祸的风险，指出：知道了不说，或听说后不行动，两者都有同样的罪过！

清廷学部对邓子完的上书很为赞赏，在批示中赞扬邓“游学日本，考察有得”，所陈意见实是“洞见本源，深中时弊”之论。显然，如果邓子完对国际、国内情况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体操理论和方法没有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要提出如此系统而完整的见解是不可能的。而在八十年前邓子完

即具有锐意变革的先进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邓除在体育科任教外，同时负责领导全川体育工作。在中国体育教育上，邓子完是有一定贡献的。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邓子完回新津参加县人侯宝斋领导的“川南保路同志军”，并任参谋之职。民国初年，邓在成都陆军小学任体育教席。民国五年，邓投笔从戎，先后参加了靖国军和护国军，转战于成、嘉、叙、渝之间，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后乃辞军返家。民国七年，在新津县修志局任职。民国十四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新津分会会长，到职后即四处募捐以修复县城外西军阀混战时烧毁的民房，受灾群众无不感恩载德。后又任县党务指导委员、宣传部长、县文献委员会次长等职。民国十八年邓去双流曾家店小学任教，后又在陶家渡办职业小学，以织布、染布为主要课程。还亲自操作制造出木质小型滑翔机模型。民国二十八年，邓子完在县城西街经藏寺创办“成人学校”，针对成人特点，在私塾基础上融入新学知识。既学古文又学自然、算术，同时设置体操课，学生皆手持木刀、木棍操练。学校由邓主持，有时也邀其兄邓古愚讲解四书五经。邓在办学中不惮烦劳，事事躬亲，如自编教材，自制模型和改良土织布机，用植物淀粉酿酒，制造木铁结构自行车等等。这些改进和制造，都因得不到支持而一一失败。

邓生性耿直，热心公益，疾恶狂傲，敢于直言，深为当道者所忌。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入川，邓子完以老同盟会会员资格到成都行辕晋谒蒋介石，要向蒋面呈治理四川的条陈②。蒋拒不接见，只令侍从室送法币二佰元将邓打发了事。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公务人员每天要参加升降国旗

仪式并要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口号。邓从不呼此口号，旁人问之，邓说：“参加同盟会我比他早，资格我比他老，年龄我比他大，为啥要呼他万岁”？邓对滥施淫威压榨百姓的地方官吏，常作诗词、对联进行讽刺抨击，曾借为榨油房作对联云：

施压制权，取脂膏务尽；
固圈结力，到粉末犹坚。

由于邓玩世不恭，敢于直言，故不见容于各级当道，而当道者又无可奈何，只得目之为“疯子”。

邓曾自行设计、操作，建一小楼于宅傍塘边（今文化局右侧处），取名“龙化楼”，以潜龙自比，亦足见其自负不凡。邓终生无积蓄，常为生活而劳碌奔波，但在承印《新津县志》（道光版修改本）时，却只收纸张费而不计其他。又以所学医道免费为人治病、送药，群众十分感激。

邓晚年生计艰难，有时日食难措，但从不向人乞怜，乃学古人“辟谷”（不食烟火之物）、“导引”（吐纳气息）之术。虽经友人劝解进食，但身体已日益衰颓，终于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时年六十八岁。

其友人童次湘作文祭之，中有：“怀报国救民之志而不见容于当时；有振兴实业之技而不见售于当世。留学归来，抱玉而泣，坎坷潦倒，遗恨以终，阮籍途穷，同声一哭，是天之亡也，岂战之罪，悲夫”！可以概括邓子完一生的遭遇。

注：本文参考《成都志通讯》《成都体育史料》《新津县志》等文。　　童汝锷整理

附录：　邓子完呈清廷学部书全文

学部大臣鉴：窃以学部之成立，全国学务之兴废系焉。学务之振起，全国教育之精神奋焉。自英士黑白徒师本萨倡言三育，为教育家之所公认，而体育遂见重于全球。夫身体不坚全者，道德不隆；精神不完健者，知识不确。学问源于精神，精神源于身体，此东西各国之解剖学、病理学、心理学诸家之通论也。故凡讲运动、讲卫生者，均不外体育之门。我国因之亦编体操科学。此固精神教育之设施，非独形式已也。

乃调查各省学堂之教育，其任体操者，非兵营无取也。即其所操于兵式亦非不谓良，特是其所措教，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不过取兵式之徒手而名之曰柔软以教小学而已。取兵式之器械以教中学及高等而已。如是人者目不识丁，口不言文，其品其性一无可取。揀其青年浮躁气为各学堂教员，侈然胖然，朝酒夜色等，不可胜数。于是学校卑之，使不得与各教员齿，学生轻之，指目以动物标本之名。吁！学生之性、养之贵驯；学生之气，炼之贵精，驯而后可以言同情，精而后可以言强力，夫人而知之矣。今以是等充教员数，则请废体操一科可也。与其强而野蛮，不如弱而腐败之愈也。

天下之事业往往不患有缺点，而患有污点，加增之易于矫正者势也。今试集体操之诸教员而问之曰：各种体操其教于生理、心理、道德上有特种之关系，有共同之关系。吾恐其未之前闻，徒事嘿嘿而已也。微独此也。又问之曰：各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之幼年期、少年期、青年期，其以何者为适当之操法，吾又恐其未之前闻，徒事嘿嘿而已也。夫修其术而不知其理由者，退化之原也，上于人而不满其资格者，冲突之本也。办学者以因陋就简之心，由一学科而坏及各学科者，理之所必致也。从学者以玩上厌学之见由一教员而延及各教员者，情之所必有也。不亟取法改良而能使全国之民精神振作、学向发达、道德增进以期比驾于列强，特立于大陆者，势之所必无而不能期其或有者也。

考各国之历史。德国有中央体操教员养成所及中央体操练习所及王立教师养成所；瑞典国有体操师范学校及中央练习所；日本有体育会、体操学校及女子体操音乐学校、其他柔道讲习所、剑击传习所，兵事讲习会，纷然林立，不暇屈指之。数国者皆以竞办体育之故而卒得其效果。

今之有识者曰扩张国家势力，曰振起国民精神，其甚者曰人种改良。似此三问题其不出体育之范围也明矣。夫其所谓体育者，非特体操已也，有卫生、有运动、有休息、有营养，而教育心理、生理、性育亦在其中。

体操则运动是已，而运动中有规则运动、自由运动、职业技术诸运动之区分。今之所用于学校者，则规则运动是也。而规则运动之中如瑞典体操，如普通体操，如兵式操，又各有其所宜；或专而精之，或兼而备之，皆必就学生之年龄以助其身体之发达。盖职业之动作，或偏、则身体之畸形易现，而生理之组织，心理之官能，皆有偏枯之弊。此体育家之所当研究者也。

故各学年之体操，皆贵加柔软法。柔软法者，运动不随意筋者也。在小学则瑞典式是，在中学则普通操之器械（哑

铃、球竿、木棒、木环、豆囊等）是，在高等则兵式之器械（木马、平台、铁棒、水平棒等）是。一则造学生之精神以促学问之进步而储办事之能力，一则造国民之式力以期人种之改良而完全立国之基础。苟非在上者提而倡之，扩而充之，目为重点，肩为急图，则体育其终难矫正而教育其终难发达矣。知而不言，听而不行，其对于天下万世也厥罪惟均。夫既言之矣，则此后之关系复何敢知。生自幼时获庭训，以中国之古操法研究其理者十余年。去年乙巳二月游日本，留学体育会体操学校，常与日之哲学家高岛氏论体育之原理，与手岛氏论体操法律及其主义。本年五月回籍，在通省高等学堂前附设一体育学堂而教之，愈觉其理之无穷。然常恨其僻处一隅，不足为全国之影响。用是述其所拟用之章程以求审定而采择焉。

（原载《四川学报》光绪３３年第五册）

附录：

清政府学部为邓莹诗呈请设立体操学堂札

为札行事普通司案呈据四川新津县廪生邓莹诗呈请设立体育学堂等情附呈章程到部，当经批示。体操一科关系重要。其功用非直强健身而止，实足以训成道德完固精神。故

注：①学部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

②条陈，即意见书。

自初等小学以上，因学生年龄之有异而教法各有所宜。为教员者尤非深谙学理不能胜任。所称各省学堂所授体操无初等高等之别，无小学中学之分，洵为深中时弊之言，亟应设法讲求以图进步。本部曾于去年三月，电行各省设立体操专修科以期养成体操教员，即是此意。该生游学日本考察有得，洞见本源，所设体育学堂科目完备。务即认真办理，仰候本部札行该省提学使司立案，并将所呈规程课目札行各省提学使司，籍备采择等因在案，为此札行该提学使司查照并将该学堂办理情形随时察看可也。此札。

新津县私立凤集小学

（一）

新津县私立凤集小学校址在金华乡宝峰寺内。前身是清末的一所义学，名凤集书院，有学生三十人左右，教师为胡洪章。民国初年，书院改为凤集初等小学堂，设初小二班，教师二人，学生七、八十人。

私立凤集小学是在原凤集初等小学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办于民国十八年，乡人胡玉笙任学校董事长。学校有校产田３００余亩，以其地租收入作为办学经费。这些土地是胡玉笙在成都驻防任宪兵司令时在本乡官公庙产中隐瞒起来的。办学的原因是金华宝峰寺离县城较远，交通不便，要

过三、四渡河，学生到县城读书困难较大。胡家在金华是个大族，办学对族中子弟上学有利，同时也可照顾附近群众子女读书。加之兴学育人也是为地方上做一件好事，能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故胡玉笙创办了这所学校。开办时，仅有初等小学四个班，聘请教师七人，学生一百余人。民国廿七年，开设高年级，发展成为具有初等、高等小学的完小。共有六个班，教师十一人，学生二百余人。

该校师资较强，校风和学风均好。学生升学率高，每年高小毕业生都有半数以上能升入初中。因此，邻县的小学都来学校参观学习，并吸引彭山县青龙场和华阳县(今双流县管辖)傅家坝的学生也来该校住校读书。

私立凤集小学教师教学认真，治校严谨。教师待遇普遍高于公立小学，学生一律免交学费，每学期对各班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前三名均有奖励，奖品为笔墨纸砚学习用品。

该校从开办至１９４９年解放，历任校长先后有胡守成、陈立尊、王治齐、陈敦五、周子惠、吕钟鉴等。校歌为首任校长胡守成作词，音乐教师青神县人周井如作曲。歌词内容是："山名牧马，景著秋成。三峰第一，人杰地灵。梧高凤集，蔚启人文。禀天行不息，强健其身心。同学同奋，共起共争，循初基之既定，达万里之鹏程。"

解放后，该校于１９５０年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金华乡中心小学校，现为金华中学所在地。

（二）

凤集小学是在民国时期新津县办得较好的学校之一，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借鉴的有下列主要经验。

一、尊师重道：该校聘用教师，要选品学兼优者，学历均不低于中等师范或高中毕业。行聘时，由校董事会会长胡玉筐委托其兄胡玉辉(学校事务主任)，到教师住处行礼（作揖）交聘书并议定报酬。教师一经聘用，不轻易变动，使教师安心教学。每学期开学和期终典礼，学校都要办酒席招待教师。每年孔子生日，（民国时期教师节）除了办酒席宴请教师外，还要备一份礼赠送教师。学生也很尊敬教师，除上下课向教师敬礼外，在路上遇到教师也要敬礼。

为了办好学校，选用好教师，该校不惜重金（给以双薪待遇）聘请。如成都市的田云樵田乃昌父子，青神县的周井如，本县城关的邓守先老师等。聘请教师，除给以月薪外，每期来去的舆马费均由学校承担。

二、优厚教师待遇，使其安心教学：抗日战争时期，公立小学教师每月只有三斗二升米津贴(每斗四十市斤)，有时还不能按月领到；即使领到，也是米条子一张，要到很远的仓库里去拿；有时连跑几次都领不到米，只好把米条子打七折或八折卖掉，教师实际上都没有拿足三斗二升米。此外，教师工作不稳定，没有保障。每年寒暑假期间为争夺下学期的饭碗，有的要给校长送礼，以求校长下期继续聘用。

凤集小学对教师待遇普遍高于公立小学教师，一般教师每月最低四斗米，教学好而教课多的每月给五斗米，少数有名教师则给以双薪待遇。教师薪米不用操心费力，校方每月派人按时运送到家，米的质量也很好。教师如有困难，可提前预支，甚至预支全学期的均可。学校免费供给教师伙食，这在全县公立小学中都是没有的。教师只要教学好，品德优

良，可以长期任教，不必为“六腊战争”争夺饭碗忧虑。老教师邓守先回忆说：“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无保障，常为“六腊战争”求得一聘书而奔走，到凤集小学后，好似跨入和平环境，连续八年未见遗弃。当时深觉人地两宜，毫无厌倦情绪。今朝回忆，前情历历，更有余味可寻”。由于教师安心，心情舒畅，都尽心尽力任教。

三、治校严谨：该校教师一般都具有真才实学，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学校领导订出每期教学计划，要求各科教师均要备课，由教导主任督促检查。教师除按时上课外，还要在学生上晚自习时，到班上去点名，并向学生讲解疑难课业。学生自习不到，初犯批评教育，三犯记大过一次。

该校特别重视国文课，要求学生背诵课文。也很重视童军、体育、音乐课。省体师毕业的童汝锷任童军体育课程，要求学生服装整齐，精神振作。童军服领带上绣一白凤以示凤集小学标志。操练时要求队形整齐，还要排出许多种队形，如摆成“凤集小学”四字队形等。体育课有兰球、乒乓球、跳高、跳远、赛跑等等。使曾在该校读书的学生至今不忘。此外，青神县人周井如教音乐，邑人疗梦儒教美术，均以教学优良留有很好声誉。

该校如发现教师行为有伤风化，则可随时解聘，解聘结帐后，额外给以路费，使被解聘者走得满意。

四、民众支持，学校秩序安定：由于该校办得较好，教师教学质量好毕业学生升学率高，本乡民众很支持学校，也尊敬教师。加以校董事长胡玉笙在本县有名望，因此，社会上的流氓、土匪都不敢到校捣乱，教师和学生的人身安全有保

障，教学秩序安定。

供稿人：徐国民、邓守先、童汝锷、胡永琅、
胡永瑛、刘素芸、李天池
整理人：李兴玉

新津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简况

童汝锷

建国前，新津城西黄鹤楼附近的忠烈祠(今７８医院处)内，设有新津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全专区(新津属第一专区即温江专区)各县中仅有的一所农业职业学校。新津农业职业学校的建立，和当时“新津农业推广所”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津农业推广所设在忠烈祠内，是省农业部门在县上设立的下属机构，由县代管。农推所主要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改进工作。有技士一人，农技员二至三人，雇工数人。农推所设农事试验场(设农场主任一人)，有试验田１０８亩。农事试验场还设立了苗圃、蚕桑指导所、测候所及“益群农场”、“富民畜牧场”等。这些机构和农推所合署办公，技术上接受农推所指导。

农推所人员设置少，也无先进科学仪器设备，仅开展了养良种猪(数头)，良种鸡(五六十只)，安哥拉兔(二三十只)及稻、麦良种试验田十余亩，其余近１００亩田地皆租给农民耕种。实际上当时的农推所只是少数项目的微型试验场，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工作，基本没有很好展开。

新津地方人士(部份县参议员、县农会主席等)，鉴于省上设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各县却无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以相适应；新津的高小毕业生除少部份考新津初级中学外就没有学校可读，一般学生也无力到成都升学，７０％的高小毕业生家在农村的大部回家务农，但又不谙农业技术知识。新津如果兴办一所初级农业学校，既有场地也有农业技术师资，经费也基本能解决。对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推广农业知识，和解决部份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是一举数得造福地方的好事，所以地方人士积极筹办。经过省教育厅批准，于１９４５年正式建立，当年即招收第一班学生50多人入学。

新津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设校长、教导主任各一人、教师及职员约十人。教职员工工资及学校办公费由地方财政开支，其余如教职工伙食（学校供给）、购置费、试验经费等则在农场出租田亩所收租谷及生产成品等收入中解决。学校不收学生学杂费，学生全部住校，伙食、书籍费由学生自理。

学校有教室四间、办公室两间、礼堂一个、学生寝室两通，还有篮球场、操场及厨房等建筑，占地约八亩。学校每年招收一班、前后共招五个班（约２５０人）。学制为三年。学校除教授普通初中课程外，尚有稻作、麦作、棉作、畜牧兽医、病虫害、园艺、林艺等农业专业课程。学生毕业

后少部份能考入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大部份回农村务农或从事其他职业。

学校虽是一个农业学校，但学生参加生产实践和农业技术学习的时间很少，绝大部份时间是灌输书本知识，除栽秧打谷农忙时派少数学生帮助农场抢收抢种外，具体实践很少。

学校校长第一任为杨诞敷，第二任是王本阳。

在1949年12月临解放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一把火把农职校烧成一片瓦砾场，学校停办，学生并入眉山农校。

中国妇女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在新津的经过

（一）保育院在新津的建立

民国廿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不少儿童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成了孤儿；有的父母上前线抗敌，无力照管儿女。为了有利抗战，拯救儿童，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于民国廿七年三月，由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李德全、史良、沈兹九、曹孟君、吴贻芳等妇女界名流，自筹资金，接受国际支援，国内募捐，在汉口组织“中国妇女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任会长，李德全等

人任副会长。其主要任务是接受战区儿童到后方教养。民国廿七年，成都各界妇女为响应全国保育总会号召，成立了中国妇女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分会下设乐山、郫县、简阳、新津四个保育院。新津为“第四保育院”。

第四保育院设在新津，主要原因是：成都分会组织委员范寓梅是新津县太平乡人，对新津情况比较熟悉，在新津设保育院，既可收战区儿童，又可收本地抗日军人的子弟入院，使抗日将士安心在前线杀敌，为抗战出力，对桑梓有利。因此，范寓梅反复向成都慈惠堂负责人陈益廷、钟体乾等多次商谈，借得新津县纯阳观内忠孝堂作为保育院院址。为在新津设保育院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保育院的性质及管理。

第四保育院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五月开始筹建，接收战区儿童和本地抗日军人子弟，九月一日正式开学。保育院属国立性质，由保育总会拨款。其方针是：培养儿童的国家民族意识，适应战时抗战建国需要，完成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隶属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领导。保育院成立董事会，设董事九十二人，由成都分会指派三人，聘请本地各界热心教育人士八十九人组成。县长赵宗炜任董事长，院长为常务理事。首任院长钟昭华，民国廿八年十二月调重庆后，由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陈肖松接任院长。该院有教职员十七人，工友十人。下设总务、教导、保育三股。总务股设会计、文书、庶务、保管；教导股设团指导五人，任课教员四人；保育股设生活管理员一人，护士一人；十名工

人分别担任炊事员、保育员、门卫、摇铃、扫地等。另设义务医师一名，专为病童治病，如有重病即转送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治疗。每学期检查体格一次，注意儿童营养，矫正儿童身体上的缺陷。

（三）保育院的教养

该院建院初期，共接收儿童二百五十名，其中男童一百九十七人，女童五十三名；这些儿童中有学龄儿童二百二十二人（男一百八十人，女四十二人），幼儿二十八人（男十七人，女十一人），本县抗日军人子女及贫苦儿童约占儿童总数的十分之一。民国卅一年，由乐山第一保育院合并七十三名儿童到新津保育院。每个儿童每月拨给二市斗食米，每月拨给八元，以六元作伙食，两元作日用品及文具费。

儿童共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胜利、建国六个团（即六个班），忠孝团是小学五、六年级，仁爱团是小学三、四年级，信义团是小学二年级，和平团是小学一年级，建国团和胜利团是幼儿园的大班和小班。

学习的课程与全日制小学一样。但读到高年级时，每周增设有360分钟的职业训练课（暑假每周增至480分钟），职业训练的选修课分农事、工艺、商业、家事四个组。农事组内学习园艺、畜养、编工、木工；工艺组学习简易机械工艺，简易化学工艺；商业组学习薄记，会计；家事组学习缝纫、纺织、烹饪。由于在高年级增设了职业训练课，全院搬运柴米及儿童的衣服、草鞋、草帽和理发均为高年级的儿童所作。保育院没有寒暑假，儿童一年学三学期的课

程，虽然加了职业选修课，学习时间仍是足够的。暑假中，成都的大学还派人来院义务讲课。

保育院儿童小学毕业后，可通过考试，录取到全公费待遇的荣昌县国立十五中学，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学及其他国立中学深造。

保育院女教师占多数，大多是外地人（河南、安徽人居多），教师由成都分会推荐聘用。总务负责人是蓝东阳（女），成都人。教导负责人也是女的，河南人。

民国三十年（一说是二十九年），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来新津保育院看望儿童，作了题为“自强不息”的讲话。院长、教员们都称他是冯夫人，儿童们亲切叫他冯妈妈。李德全在讲话时对儿童说：“我虽然嫁给冯副委员长，但是，我有我的姓名，我叫李德全。”

该院教师对儿童管理严格，规定每天早晨起床要练跑步，除到县开会检阅外，一年四季不戴帽子，洗脸一律用冷水。有年“三八”妇女节，教导主任出题为“妇女是否应该解放？”要女同学准备作真理发言，男同学们准备反驳。辩论结果，女同学获胜。

由于教学质量高，体育锻炼好，每年全县四月四日儿童节举办讲演比赛及踢毽比赛时，该院均名列前茅。

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院奉命迁回南京。本县儿童并入新津县儿童救济院学习，直至解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